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landscape painting. It depicts a vast mountain range with steep, craggy peaks. The mountains are rendered with varying shades of brown and black ink, showing texture and depth. Numerous pine tree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slopes and ridges, their dark needles contrasting with the lighter rock. In the lower right, a small, traditional Chinese pavilion with a tiled roof is nestled among the trees. The overall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classical Chinese landscape art, emphasizing natural beauty and harmony.

文教史料



吕峪沟“抗大式”高中班创建纪实

顾梦红*

“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培养出 10 多万军政干部。在 20 世纪 70 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吕峪沟“抗大式”高中班成为房山教育界的一枝奇葩。

一、家国情怀定决策

从 1966 年 6 月开始，学校不能正常上课，高中、大学不再招生。常乐寺中学 1970 年即将毕业的初中学生，入学后没有学到系统的文化知识，十六七岁就要回到村里拿起锄头镰刀干农活儿。虽然农家子弟不怕吃苦受累，但是年龄尚小，体质、心理发育尚未成熟，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农村急需有文化知识的年轻人改变落后贫穷的面貌。然而，当时这个地区还没有高中学校。常乐寺中学党支部书记王玉璋对农村孩子的前途命运

* 顾梦红：房山区政协原常委，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



格外关心，1970年8月，他在领导班子会议上提出创办吕峪沟高中的想法，得到一致赞同。

崇各庄公社党委书记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他对王玉璋说，初中毕业生刚刚十六七岁，无学可上太遗憾，但是在哪里办高中，房子怎么盖？经费从哪里来？教师从哪里来？王玉璋表示，革命前辈创建抗大学校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要继承延安抗大精神，不向国家伸手要钱，不向学生要伙食费、住宿费、学费；边学习、边劳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我们有能力把抗大式高中班办好，让学生、家长都满意。公社党委见王玉璋决心坚定，很快召开了北五村和石灰场支部书记座谈会，各村书记一致表示全力支持办好高中班。

二、披荆斩棘建校园

1970年秋，王玉璋与学校领导班子多次进山探勘选址，最终选定距常乐寺中学十几里的吕峪沟南侧的山坡上。这里的地势和土壤便于挖土洞，冬暖夏凉，能够解决师生的住宿和教室。按照当年的学历安排，因初三学生是寒假毕业，高中学生在寒假后入学。1970年10月中旬，校址刚刚落实，教师、教材、教室、食堂、宿舍诸多问题还没有着落，千头万绪，亟待解决。为了保证正常开学，党支部决定，立即组成先遣小分队进山，建设校舍。

1970年10月20日，游玉亭和李平老师带领李学贵、孟凡友、



王兴会、王爱国、于志和、于连海、王春长、王春来、王振宇、李德长、翟凤友等十几名初三年级男同学组成的先遣小分队开进了吕峪沟。进山后第一要解决吃住问题。翟凤友、李学贵、陈俊等人把一个旧羊圈收拾后住下，另外一组住在山上老杨家的旧房中。没有床板、没有火炕，在地上摆放几块稍微平整的石头，铺上干草就是睡觉的地方。第二是吃饭问题，没有做饭的炊具，更没有厨房，每组只有一口锅。同学们用三块石头支起锅灶，烧火做饭，每天都是白薯棒糝粥、蒸白薯、窝头和自带的咸菜疙瘩。咸菜吃完了就到生产队的地里捡拾农民收秋剩下的很小的萝卜头、蔓菁疙瘩加上少量食盐当菜吃。王玉璋看到伙食这样差，就用自己的米面票买些大米白面，给正在长身体的同学们增加营养。

小分队主要任务就是挖窑洞。这里的土层有两三米高，很厚实，挖开黄土以后，依山就势把窑洞前面的半坡垫平，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场院，作为师生们活动的场所。屋顶需要很结实很直挺的树木作为柁、檩与椽子，附近山沟里没有可以充当柁檩的树木，窑洞房顶怎么解决？是个很大的难题。

旧社会山里农民家里贫穷，又急需盖房，就用荆条、灌木枝条，捆成几十个很粗的把子，编成相当于屋顶面积的大平排面，以拱形铺设在屋顶，上面覆盖沙子灰，能够解决房梁与柁檩的问题。老师同学们由此受到启发，在南坡土层较厚的地方挖地坑，上边用荆条梢子捆扎后支成拱架，再用黄土覆盖，建窑洞式简易住房。游玉亭、李平带领十几个小伙子奔赴距离住处



十几里的双尖岭、九渠山上割荆条梢子。手指被镰刀割破了，抓把土按住止血，又继续干活儿；渴了就捧起山崖下泥坑里的水解渴；饿了就啃几口早晨带来的窝头或烤白薯充饥；夕阳落山，强忍饥肠辘辘，迎着寒风背着一百多斤荆条柴火回到十几里以外的住处。20多天以后，终于备足了做房顶用的材料。

在当地村里项大爷指导下，同学们用乡村捆扫帚的办法，先用铁丝两头绑上横木把，将荆条梢子交叉码放成长条状，同学们两人一组用力拉紧铁丝，然后再用野藤条捆紧打扣。荆梢支撑龙长约3米，每30厘米捆扎一道。用这样的支撑龙，架在挖好的土洞上，铺上柴草，用土压实，铺上塑料布，再用土压实，窑洞基本建成，师生们兴高采烈。然而，满心欢喜换来的却是沮丧与愁苦，原来捆绑的圆柱形靶子，经过几天日晒变得干脆、松懈了，再加上拱形支撑龙承受力不够，洞顶被压下一个大坑。建窑洞试验失败后，学校领导多次到附近村里向老农民请教，向村干部求助。晓幼营村支援学校部分檩条，盖新校舍。

1970年12月初，王玉璋校长和游玉亭、李平老师带领李学贵、王爱国、王春长、于连海等第二批小分队又踏上了建设窑洞的新征程。

晓幼营村支援的檩条解决了房顶设施。师生们把檩条架在挖好的土洞上，再用割来的荆棘灌木覆盖，铺上黄土和防雨防渗漏的塑料布，再以黄土封顶。在窑洞内，提前预留了长条炕形状的土坎，仿照农村土炕结构。在土坎内挖好烟道，留好烟



囱和烧火洞口，石板封炕面和泥抹平，点火烧干。两个多月的艰苦劳动，七个窑洞终于建成了，第一届高中班学生学习劳动生活的条件基本具备。

第一届高中班主要生源是北五村(北四位、常乐寺、晓幼营、西石府、南四位)的初三学生组成。一些家长并不愿意让子女上高中。有一位男同学的爸爸说，高中班就是干农活儿，还要贴上口粮。你如果在生产队里干农活儿，还可以挣工分。你这两年挣的工分，可以够盖三间房，给你娶媳妇用。一位女同学的妈妈说，女孩子会写自己的名字，认识钞票就够用了。过几年就结婚生孩子了，上高中有什么用？还有些家长因为家庭的暂时困难，眼光短浅，坚持让孩子退学回家挣工分。王玉璋校长、孙树起等老师非常焦急，担心退学会耽误孩子的一生。老师们不辞辛苦走家串户，苦口婆心地劝说，给每位退学的同学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催人醒悟的信，使家长深受感动，明白了退学耽误孩子前程的严重后果，终于让这几位退学的孩子很快陆续返校。

开学第一天，王玉璋校长给同学们简述了延安抗大的历史和办学特色，要求同学们牢记三大作风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学习老一辈革命者艰苦创业的精神，他提醒大家要做好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1971年第一届高中班共计31名同学，基本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吃住和学习都在新建的窑洞进行。



第一届师生在窑洞前合影

1972年春第二届学生招生人数较多,教室和宿舍不够用了。王玉璋校长和晓幼营村项玉坤书记,北四位村梁路书记多次研究,决定在距窑洞不远的河滩上边较平坦的空地上建设新校舍。在石灰厂和北五村党支部的支持下,在大井南边建起教师住宿和办公室、教室、食堂、女生宿舍等24间平房,还修建了篮球场,满足了师生的学习食宿要求。

第二届高中班同学刚刚入学的时候,新校舍还没有完全盖好,同学们早晨从常乐寺中学出发,走10多里路,到校后进行建校劳动,下午三四点钟返回常乐寺,每天走20多里路,还要进行几个小时的体力劳动。为了让新入学的同学深刻感受延安抗大的精神,体验吕峪沟高中班的创业艰苦,学校决定每届同学都要在窑洞里住宿一年,再搬到新建的宿舍里。



三、垦荒耕耘汗水咸

吕峪沟高中班的学习与劳动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它继承了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精神，也传承了中国农民教育子女的勤劳善良传世家训。前两届学生最初的劳动是开荒种地和割草，用汗水和智慧改变学习和生活条件，满足学校各项开支和教学、生活的需要。

1971年初，师生们在乱石满山的荒山坡上开山垦荒。这里是偏坡溜岗，黄土不多，乱石遍地。春寒料峭，山风凛冽，十六七岁的姑娘小伙子抡起扳镐、尖锹、十字镐，刨除杂草、挖出顽石，挥汗如雨，把珍贵稀少的黄土聚拢、平整，形成大小不等的一块块可以种庄稼的土地。山坡不易水土保持，必须给每块土地垒起地阶，修好堤堰。遇到山石坚硬，还要打眼放炮采石，解决垒地阶用料问题。当年生活条件清苦，多数同学只穿一件小棉袄，没有内衣，为了防止被流淌的汗水把棉袄湿透，小伙子就赤裸臂膀抡锤砸钎，汗水仍然流遍全身。经过几个月师生的不懈努力，终于开垦出了一块块山坡地（8年间累计开垦荒坡土地近50亩）。

1971年春，久旱无雨，同学们从距离白薯地三四里路远的废弃的矿井里去取水。身强力壮的男生挑水上山，两桶水有七八十斤，沿着河滩走上两三里路，再一路上坡走近一里多地挑到山坡上。身体柔弱的孙学敏挑水时候，两手攥着扁担前半



部，磕磕绊绊，一路颠簸，往返几趟，肩膀就已经磨得脱了皮。在如此艰辛的困难面前，同学们谈笑风生，争先恐后，你追我赶，没有人叫苦喊累。有一天外校的师生来吕峪沟高中班参观学习，张志福和几个同学左右肩膀轮换双肩挑，还有一位同学两只手各提一只水桶，在山路上奔走。参观的师生们都赞叹不已，为他们鼓掌加油。

新开垦的土地适合种谷子、玉米、白薯、荞麦。为了让同学们尽快掌握农业技术，晓幼营村等北五村选派了人品好、农活精湛的贫下中农代表项德明、赵瑞、韩德宽、邢友等4人与师生同吃同住，参与学校管理。他们耐心教给同学们各种农业技术，鼓励同学们战胜各种困难。调白薯埂是个技术活儿，赵翠华等几位同学拿镐调埂，不但歪七扭八，而且手都打了血泡。老农邢友就手把手的指导她们：两腿岔开，目光看着前方，左边3镐，右边3镐，把熟土兜起在中间，形成梯形三面体，然后用镐把埂面抹平。在老农的指导和鼓励下，这几位女同学终于能够调出像模像样的白薯埂了。同学们还懂得了“旱耨田，涝浇园”的道理，学会了“一二三的谷子，四五六的黍子”的间苗方法。同学们对这几位农民大爷像对待父母一样敬重，和他们一起劳动热情高，干劲足。

伏天里农活儿相对少一些，学校组织男同学上山割荆条。天气闷热，汗流浹背，渴了他们就找山泉水。当渴的实在受不了又找不到山泉的时候，就找存有积雨水的山石低洼处，扒走水中的羊粪球和漂浮的水生动物，趴下喝几口，又继续



上山割荆条。

1971年秋季，第一个丰收的季节到来，同学们看着沉甸甸的谷穗，满心喜悦。李学贵带领大部分同学去“老爷儿大洼”收割谷。这片谷长势良好。大家挥镰割谷，劲头十足，直到中午12点后才收割完毕。此刻同学们都盼望着早些收工回到学校，饱餐一顿，舒舒服服睡个午觉。当大家捆好了三四个不等的谷个子准备背起回到学校的时候，李学贵发现还剩下几个谷个子留在地里。派人再来一次又不值得，扔在这里又十分心疼，李学贵一咬牙，用三根绳将它们捆扎一起，用尽了吃奶的力气背起了8个谷个子，艰难的迈开脚步向学校走去。回到学校一称，足有240多斤。

为了增加学校的收入，学校组织师生进山开采石英石。山坡陡峭，开采起来很困难。初冬季节，师生们走到开采地就是一身汗。寒风吹来，冰冷刺骨，棉衣里汗水冰凉。同学们手扶钢钎，抡起大锤，进行紧张艰苦的采石劳动。陈广军虽然在班里年龄最小，但是他抡起4公斤重的八磅大锤也是虎虎有生风，每天打眼的进度总是名列前茅。扶钢钎的同学也不轻松，双手常常震的裂口，大锤砸一下钢钎，必须借势将钢钎提起并且迅速旋转角度，如果不转动，打深了则钢钎拔不出来，打出的炮眼也不圆，装炸药不够量，影响爆破效果。装炸药这一环更加重要，把带导火索的雷管插入药棒，轻轻用木棍捣实。这个时候最关键，用力太轻会影响爆炸效果，用力大了可能出现爆炸事故。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同学们都掌握了打眼放炮的技术。



当年，铁道兵在房山境内修京原铁路，修铁路要用大量石灰岩石子来铺路基。学校组织师生到石子场砸石子，运到火车站装火车。石灰场的爆破下来的石灰石有大有小，大的有几百斤甚至上千斤，较小的也有十几公斤。师生们把大块、中块的石灰石破小，称为改石。改石活儿又累又险，弄不好打飞的碎石打到身上就会头破血流，甚至伤筋动骨。下午同学们将石子用独轮车运到火车站，沿着搭在火车车厢上的长木板往车厢里推。收工的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还要走七八里山路回到学校。饭后上晚自习，还要完成老师布置的各科作业，有人做着作业就睡着了。

秋收以后是旧时农民“忍冬”的季节，上山割草割柴成为高中班同学们每天的“必修课”。割柴为了烧炕取暖，割草是为了卖钱，改善办学条件。为了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学校实行劳动竞赛，每人割的柴草回到学校要称重量，看谁割的多，进行表扬。深冬的早晨北风呼啸，早饭后同学们到达山顶，寻找粗壮的荆木和硬杂灌木。捆柴也是技术活儿，一般捆至少两道腰儿，再在中间拴两个背的绳。上面的背绳头必须用手紧紧握住，万一出现危险，把绳头一松，柴和人可以分离，人不至于从山上摔下来。割柴的日子充满了艰辛。有一次赵迪霞带领女同学到了南山割柴，这里见不到太阳，山高风大，刚割一堆放下就被风吹跑了，捡回来赶紧用石头压好再去远处的山坡继续割。她们就把捆好的柴火从山高处滚下来，滚到较好走的地方再背起来，如果捆不好，滚下来的柴火都散了，同学们就互



相帮忙再捆起来。赵迪霞有一次割了95斤，都快超过她的体重了。她将整捆柴立起来，跪在地上，肩膀认好背绳，右手抓紧背绳，左手抓住地上的荆条，整个人匍匐在地，身体基本和地平行，然后一条腿先站起来，单手撑地，另一条腿再慢慢站起来，艰难地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那时候姐妹们年轻气盛，背着柴火，笑着唱着，返回学校。

放羊是很让人羡慕的活茬。第六届学生刘瑞开始也觉得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后来遇到羊群散乱无章，晚间不好收拢，羊群出现疾病等情况，他就虚心向老农请教，了解羊的性情和活动的规律，逐渐掌握了放羊的技巧。当羊群散落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的时候，刘瑞就从书包里拿出课本，安静地读几页书，思考几个问题。放羊既有乐趣也有艰辛，甚至危险。一个初冬的傍晚，山风呼啸，刘瑞赶着羊群准备归圈，突然发现两只黑山羊在远处陡峭的山崖上。他吹哨子，甩鞭子，掷石子都无济于事。他迎着寒风，拄着鞭杆，艰难地爬上陡坡。就在他接近山羊，直起身想把它们赶下来的时候，一阵猛烈的山风刮得他脚下一滑，整个人从30多米的山崖上滚落下来。幸亏是冬天，头上戴着棉帽，身上裹着羊皮袄，否则就会摔得伤筋动骨了。

养鸡养猪是农村家庭妇女的日常生活，但是对于高中班年轻的女同学来说并不轻松。鸡舍在离学校有两华里半山腰上的环秀禅寺破旧的寺庙里。白天看不见人影，夜晚黑漆漆一片，李淑兰和冯淑凤两个女孩子每天早晨从学校旁边的水井里打两桶水，轮流挑着走在陡峭狭窄的山路上。在封闭严实的寺庙里，



到处都是鸡屎、鸡毛，难闻的味道呛得人几乎窒息，她们每天还要想方设法防止黄鼠狼、蛇等对鸡的伤害。

多年后，第二届毕业生杨东升总结了在吕峪沟高中班的劳动中，同学们学会了割柴、割草；拉耩、耕地、播种、收割、烧白薯炕、轧场、扬场、砌墙、打井、打炮眼、放炮、放羊、编背筐、篮子、背篓；种菜、养鸡、养猪等 26 种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技能。

四、学以致用读书乐

吕峪沟抗大式高中班遵循延安抗大“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原则，把书本知识与社会生活相结合，引导学生学以致用。为了让同学们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王玉璋校长选派了常乐寺中学的优秀教师到高中班任教。游玉亭老师是党员，教物理和化学兼做负责人；王德立老师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功底深厚，教数学、政治和历史；21 岁的孙树启有农村生活和生产的历练，是党组织的培养对象，学校让他身兼多职，教语文课，担任班主任，同时还负责共青团工作和管理学生生活，组织劳动和文娱活动等。1972 年，学校党支部发展了孙树启、王德立为预备党员，又增派女教师王珉珠教语文，王凤信老师教数学。第四届以前高中班先后任教的老师有游玉亭、孙树启、王德立、王珉珠、王凤信、孙贵山、李平等。孙贵山是继游玉亭老师之后的负责人。建校初期，王玉璋校长每



隔一天进山一次，有时候就住在窑洞里，有时候夜里 10 点多步行 10 多里山路赶回常乐寺中学。王校长为人谦和，处事稳健，在教师和同学们心中具有很高威望。他教学经验丰富，还抽出时间给同学们上物理课、政治课，他不仅能够及时解决办学中遇到的困难，还经常组织师生文体活动。

这些老师的教学水平和敬业精神令同学们钦佩。王德立老师家在长沟西甘池，回一趟家需往返七八十里路程。一个冬天的周日下午，他骑车行至坨里化工厂附近的时候，突然自行车链子断了，周边没有修理自行车的摊点，王德立老师硬是推着自行车步行十几里山路赶回学校。王珉珠老师家住北京城里，星期天下午返校需要在市里换几次公交车，有时候傍晚才到达云岗，步行 10 多里山路赶回学校，她从来没有耽误一次课程。王德立老师联系生活实际讲述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很吸引人；孙树启老师讲语文课，通俗易懂又深刻挖掘文章的内涵；游玉亭老师还经常讲一些物理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让同学们感受到物理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王珉珠老师讲述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时，声情并茂，充满激情，同学们听得如醉如痴；王凤信老师上数学课的时候，带着学生们爬到山顶，测量“环秀寺”周边的流域面积，结合当地的山形水势讲任意角三角函数。前两届同学的生活学习条件很艰苦，最初的时候，教室里连桌椅都没有，第一届同学 31 人挤在一个窑洞里听课，晚上趴在窑洞的土炕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作业，特别刻苦认真。由于教学和管理工作的需要，学校从前几届优秀的毕业生中，



选拔了充满了青春活力的赵迪霞、李学贵、吴秀荣、张志福、白永祥、田军海、屈建基等同学留校担任参与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

当年吕峪沟里没有通电，老师备课、学生上晚自习一直用煤油灯照明，难闻的煤油味道熏得头昏脑涨，油烟熏得眼圈发黑。第三届同学入学以后，住宿和学习由原窑洞搬到了平房，用餐有了平房食堂，晚自习照明也由煤油灯改成了汽灯，四五十人的教室用上两盏就非常明亮。但是汽灯仍然以烧煤油为燃料，气味难闻，上完晚自习鼻孔里就熏满了黑油烟。第三届学生田军海爱读书，他经常借阅学校《科学实验》等杂志，思考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王玉璋校长鼓励田军海进行手扶拖拉机做动力发电的实验，解决学校的照明难题。王校长找来一台破旧的 2.8kW 三相异步电动机，田军海利用电容器励磁原理，用废旧材料做了一个小配电盘，安装了一只 500V 电压表、频率表和几个开关，又自己花了 12 元钱买来 6 个 500V2 μ F 电容器，几天后三相异步电动机发电终于试制成功了，解决了学校用电照明，彻底改变了学习生活环境。

高中班的同学都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每天挥汗如雨的劳动之后，又精神抖擞地坐在教室里聚精会神的听老师讲述，在紧张艰苦的劳动之余，抓紧点滴时间如饥似渴的读书学习。1978 年高考，卢进勇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之后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学校特别注重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开办了电机组，铸造



组，同学们通过组好一台电机，铸造出一个铝制品铸件，获得了学以致用成就感。20 世纪 70 年代，崇各庄地区用电比较紧张，电压不稳定，一些农用水泵、脱粒机的电机在非额定电压下强行启动，因为负荷过重，电阻过大，经常将电机烧坏，耽误农业生产。为解决各生产队燃眉之急，1974 年春，学校成立了修理电机小组，到田间地头，用独轮车把附近农村生产队坏的电动机推回来，修好了再给生产队送回安装好。由于修理电机质量好，速度快，省钱又省工，得到崇各庄公社的干部群众称赞。

五、青春之歌放声唱

高中班的物质生活贫乏清苦，劳动艰辛苦累，但是，师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用汗水和梦想唱响了青春之歌。

住窑洞——黄土窑洞大约三米宽、七八米长。窗户是几根木棍捆上塑料布固定在土坎墙上；门是用几根护山锥捆成的门框，上边捆上塑料布，用铁丝把门捆绑在门框上，冬天四处透风。窑洞内有一大通炕，最大的窑洞能住 11 人。进门口处的炕下有烧火口，烟道一直通到里边。土炕是潮湿的，柴草是半干的，冬天傍晚烧炕的时候，窑洞里全是烟，烧炕的同学呛的眼泪奔涌。第一届高中班的 11 位女生挤在一个大炕上，刚刚躺下的时候温度很高，热的人翻来覆去。早晨起床时候被窝里就仅有自己的体温了。早晨把褥子卷起来，整个炕席都是湿的，褥子



也是潮湿的。窑洞的房顶经常有土掉下来，夜里睡着了弄得满脸都是土。夏天酷热，狭窄的窑洞内十分闷热。一个盛夏的深夜，劳累了一天的女同学已经进入梦乡，一只蝎子从屋顶掉下来蜇了王素英的脸，疼得她惊叫一声，姐妹们赶紧给她吸吮蝎子的毒汁，找校医给她敷药，总算是有惊无险，很快大家又酣然入梦了。

吃窝头——吕峪沟高中班的学生都是农村户口，不享受城镇居民定量供应粮油待遇。最初的伙食是同学们由家里背来玉米面，交到学校伙食管理员处，换成统一用的饭票。如果饭量大，吃得多，就要多交粮食。许多家庭拿不出更多的粮食给正在长身体且每天进行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学生。经过王玉璋校长多方奔走，费尽周折向粮食部门求援，市里粮油主管部门特批，才逐渐解决了粮油的问题。春天，同学们上山采摘野韭菜，放点儿盐当菜吃，或者做馅儿蒸团子，改善伙食。学校的地里种的豆角、茄子成为食堂蔬菜的来源，偶尔有点儿肉星就是天大的喜讯。劳动强度大的时候，有的男同学能够一顿饭吃六七个窝头，有的女同学也能够吃四个。“天天吃窝头”成为同学们的口头禅。

养猪养鸡、淘厕所——为了支持吕峪沟高中班工作，驻地军队给了学校一头猪，两周以后生了一窝小猪崽儿，同学们很是惊喜。学校安排孙玉金和另一位同学照顾小猪，考虑到那母猪需要增加营养，她们俩就上山挖野菜打猪草，尽量让母猪吃得饱。年底卖掉了活蹦乱跳的猪崽儿，增加了学校的收入，师



生们的伙食也得到了改善。

淘厕所是最脏的活儿。淘完厕所之后，还要挑上山去，作为庄稼的最好肥料。一天早晨，孙学敏与白翠英淘满了两个粪桶之后往山上运。一根扁担两只桶，白翠英在前头，孙学敏在后头抬，拐弯儿时，孙学敏一个趔趄，跌倒在地，粪桶里的粪洒了她一身，她们顾不上脏臭，抬起粪桶继续上山。班干部、团员都强忍着难闻的气味，轮流淘厕所，没有叫苦喊脏的。

文体活动——在物质生活清苦，文化生活禁忌多的年代，在远离都市和村庄的山沟里，师生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年轻人充满了活力，即使腰酸腿疼也要娱乐。晚上四野寂静，烛光闪烁，王玉璋校长与同学们一起又说又唱，自娱自乐。第二届同学入学后，校舍条件逐渐改善，学校在教室外面搭起了乒乓球台子；在食堂前面的平坦地里，同学们利用业余时间开辟了简陋的篮球场。那时候，几乎每周都有篮球赛，同学们在球场上生龙活虎，同学们呐喊加油，场面十分热闹。

为了丰富同学们的文化娱乐生活，1971年春节前夕，学校组织第一届师生联欢会，老师和同学们兴致勃勃的演唱红色歌曲，样板戏选段，还自编自演《贫下中农一盏灯》以及快板书、对口词等节目，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心态使得艰苦的生活学习中充满了欢乐。

第四届学生进校的时候，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师生来吕峪沟高中班体验生活。他们为高中班创作了四首歌曲，歌曲旋律优美，激情饱满。同学们在山坡上劳动的时候对着蓝天白云唱，



晚上在宿舍里打扮起来表演唱；走在路上，回到村里都在唱。学校的文艺演出队还在公社石灰厂和附近村子里演出，受到乡亲们的欢迎。

1974年，是吕峪沟高中班最红火的时候，教育教学工作有了一套成型的经验，社会声誉与日俱增，得到北京市教育局的表彰。1974年5月，北京市教育局领导带领10多个郊区县的教育局长、师范学校的校长到吕峪沟高中班参观学习，房山县许多公社都派人到吕峪沟学习，一些学校邀请王校长介绍办学经验。长操、张坊、长沟等公社都办起了抗大式高中班。1977年2月遵照上级指示，抗大式高中班不再举办。第七届学生入学一年后，1978年初由常乐寺中学负责管理。

办学8年，吕峪沟抗大式高中班共招收七届学生，总计320多名毕业生。抗大式高中班改变了320多名毕业生和他们的家庭的人文素质，改变了这个地区的文化结构。毕业后同学们走进军营，立功受奖，成长为部队的校级军官；走进乡村医院，成为救死扶伤优秀医务工作者；走进学校，成为学校领导干部或学科带头人；走进国企，成为能工巧匠或者管理人员；走进党政机关，走进乡镇、社区、村庄，担任党政领导干部，他们竭诚尽职，为改变家乡穷困落后的面貌，奉献出智慧与心血。



北岳三中

张长路

良乡中学在建校 75 年的历史中，曾经短暂使用过北岳三中这个校名。而北岳三中又曾为良乡中学注入了红色基因。

一、北岳三中的建立

北岳三中是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诞生的。1947 年春，周谔和易居二人受阜平行署的派遣，来到平西解放区筹建北岳三中。

两个人到了平西后，先到专署所在地塔河村报到，专员是高振德。由于北岳三中的地址、人事等一时还确定不下来，于是他们根据专署的指示先到田寺去办学习班。

在赵亚平（高振德的爱人）的领导下，田寺学习班办起来了。学员有四五十人，他们大都是当地的高小毕业或肄业，多数是土改中从各村抽调出来的青年干部。田寺学习班是北岳三中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时事、政策，学习的



目的是为全国解放后培养、准备基层干部。

这期学习班办了半年多就结业了，所以将这样的班叫“短中班”（也叫干训班）。“短中班”的学生毕业后由专署面向全地区分配，其中一部分学员参加了解放军南下。

1947年秋后，北岳三中又搬到了李家庄，继续筹建工作。当时去李家庄的有校长赵亚平、教导主任王磊，教员谭久皋、高明远、孙俊卿、易居和周馍。接着又招收了第二批学生。第二批的学制原定为三年，为了与第一批区别开来，将这样的班叫“长中班”。学生来源大致和第一批相同，人数较第一批多，100余人，分甲乙两班。“长中班”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政治、生物、音乐、体育等。没有课本，教材由教师自选自编，学生抄笔记。经费开支是供给制，政府发助学金，学校管吃、管住。

从1947年冬到1948年冬，第二批学生已经学习了一年多了。恰恰就在1948年的冬天，良乡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二、北岳三中接收良乡中学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华北解放区也在不断扩大。1949年1月，中共中央宣告成立华北解放区，由原晋冀鲁豫边区与晋察冀边区合并组成。实际上合并成立华北解放区这件事早在1948年5月就开始了，到1948年底，华北解放区共辖7个行政区和两个直辖市，其中之一就有北岳行



政区。北岳行政区由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各一部组成，因境内有北岳恒山得名，全区共辖 5 个专区，其中第三专区辖涞水、房山、宛平、良乡、怀来、涞涿、昌宛 7 县。

1948 年 12 月 14 日凌晨，华北军区第 7 纵队第 20 旅，在旅长刘秉彦的带领下，解放了房山县城。良乡县城的守敌听说房山县城丢了，连夜弃城逃跑，所以良乡县城和房山县城一起回到了人民手中。1949 年 1 月，北岳三中按照上级的指示，迁校出山，从李家庄来到良乡县城，接收良乡中学。北岳三中的近百名师生，身穿灰色服装，头戴红色五角星，冒着纷飞的大雪，背着行李，在女校长赵亚平的率领下，徒步行军百余里，于傍晚前走进良乡中学。在这近百名师生中，就有王磊、谭久皋、高明远和易居，另有包括孙俊卿在内的一部分北岳三中师生到房山去接收房山县中。

良乡中学回到人民的怀抱后。迅即成为北平市委、北平市军管会培训北平接管干部的地方。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就曾于 1949 年 1 月 20 日在良乡中学为北平接管干部作《关于北平情况和接收任务的要点》的报告，这也为良中注入了红色基因。

三、良乡中学的建立与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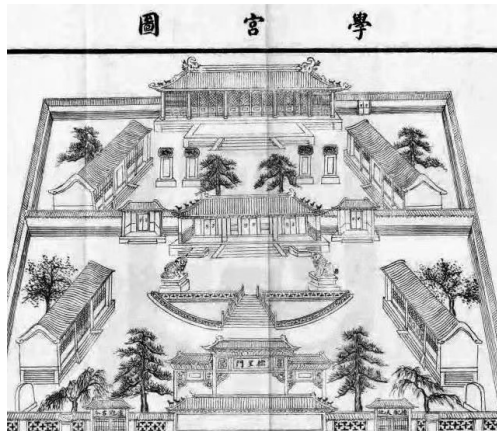
日寇在占据良乡期间，为了搞奴化教育，于 1945 年春，在良乡县城内开始筹建伪良乡中学，并冠以“河北省立”的大名。



第一批学生于 1945 年 6 月在良乡镇小招考。7 月发榜时，正式录取 120 人，备补 30 人。9 月正式开学，校址在良乡城内罗府街路北 29 号，原“新民会”旧址内。报到时，学生不足 100 人，其中有 30 余名女生，编为一个男生班，一个男女生混合班。教师和勤杂人员共 10 余人。开学典礼时，国民党在良乡的“党政委员”全部出席，县长裴洪远在会上要求学生“继承和发扬三民主义……”当时，学校开的课程有语文、数学、外语、修身等科目。

1946 年校址迁到位于良乡城内东斜街北侧的孔庙内，学生们在大成殿和后院操场北边的原看守所上课。之后，又在泮池的西侧加盖了 6 间教室和 1 间传达室。

1947 年良乡县长易人，由贾建民出任。良乡中学也从此改名为“良乡县立良乡中学”。为“弘扬政绩，兴教办学”，贾建民又在泮池东侧盖了 6 间教室，而且还特意为自己竖了一块奠基的碑石。



孔庙（或文庙）大成殿



这时，学校已发展到初中六个班，并开设了师范班。学生 300 余人。学校内不仅有校长室、教务处，还设立了由国民党良乡县党部直接控制的“训育处”。开设的课程也多了。中学班除有数、理、化、语、外等科以外，还有国学（讲论语、孟子等）、党义（讲三民主义等）、童子军训练等科目。师范班除设文化课以外，还有教育概论、乡村教育和音乐等课程。

校内由国民党、三青团控制。教师上课受监视，常有“教导干事”在窗外偷听。学生无言论自由，有“违纪”言行，训育处就传询，住校的那些男同学受到管制就更多些。

那时的良乡中学并不像一个正式的学校，祭孔在那里举行，选伪国大代表在那里吵闹，军统 0760 部队搞宣传在那里喊叫，连还乡团抬棺列队办“追悼会”都在那里号叫。学生读书无目的，教师教书为挣钱，办学的董事们为捞油水……总之，不像个学校。

1949 年的农历年（一月二十九日）和元宵节（二月十二日）过后，良乡中学复课开学了，学校正式更名为北岳三中，校长由赵亚平担任。1949 年 3 月，华北解放区行政区划调整，建立了察哈尔省等行政区划。察哈尔省由原察哈尔省全部与河北省、山西省各一部组成。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下辖 7 个专员公署，其中平西专署辖涞水、房山、宛平、良乡、怀来、涞涿、昌宛 7 个县政府。北岳三中由原隶属于华北解放区北岳行政区第三专区，转隶为华北解放区察哈尔省平西专署。转隶并没有影响学校的正常工作，在这片获得新生的校园里，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开始了全新的生活。那时候，无论校会、班会、团员大会、学



生大会，还是课间休息，除了上课学习之外的所有时间，校园里的欢歌笑语不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和《你是灯塔》等许多歌曲，脍炙人口，同学们百唱不厌。

随着北岳三中师生的到来和新生的不断增加，孔庙显得有些局促，与孔庙南门隔东斜街相望的原国民党县党部被划归良中，人们开始习惯地称之为南院，把孔庙称作北院。北院主要是校部和教学区，南院作为生活区，有男生宿舍，食堂、猪圈、豆腐坊，后来又修了操场。刚刚解放的良乡百废待兴，全校师生以“抗大”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校园建设高潮。学校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参加砌院墙、修甬路、种花木、淘厕所、搞卫生、修操场等一系列建校和为生活服务的劳动，还在西门里城隍庙后身开了六十亩地的菜园，由学生分班负责种菜。学校还组织学生养猪、磨豆腐，有时还分班轮流由伙食委员带领同学去为食堂买粮运煤……学生们不怕脏累，在思想上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当他们在自己修建的操场上运动、喝着自己磨制的豆浆，吃着自己生产的蔬菜和肉食，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充满幸福和自豪，在不知不觉中升腾起了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

学校建立了党总支委员会，赵亚平校长任党总支书记，下边分设教师支部和各年级学生支部。学校在党总支的正确领导下，开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加快了学校改造和发展步伐。学校党团组织通过政治课和各种思想教育活动，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安排有关解放战争战绩的报告会和土地法大纲讲座。



新学校的课程设置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取消了内容反动的“公民修身课”和充满封建色彩的“国民课”，删掉了外语教材中崇洋媚外的课文。开设了时事政治课和哲学常识讲座，增设了劳动课，还专门为师范班举办了“老解放区教育概况的介绍”系列报告。最有吸引力的要数时事政治课。听了这些课，大家就如同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只需读书，莫谈国事”的黑暗小天地中走了出来，突然一下子视野开阔、大见光明、心地宽广了。“世界是谁创造的”“到底谁养活谁”“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努力学习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都通过听课得到了较好的回答。通过学习《社会发展简史》知道了劳动创造世界也创造了人本身；通过学习《哲学常识讲义》，知道了物质与意识、认识与实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学校注重课内学习与各项实践活动密切结合。数学教师经常带领学生到大自然中去讲几何知识和进行实地测量；理化老师指导学生在劳动、生产、生活中运用已学知识；语文老师倡导学生自己分析课文和评述同学的作文；外语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外语会话；美术老师带领学生到野外写生或到街上去刷写大型美术宣传标语……总之，各个学科都积极创造自己的新途径，联系实际、运用知识。

学校全员住宿，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秩序井然。出操、集合各班都有固定的队形和位置。早、中、晚三餐前，全校要统一列队唱歌，待伙食管理员或值日班长发出哨音，同学们才能按顺序进入事先排定的地点就餐。上课都有严格的课堂常规。



晚自习时，学生们都伏案疾书，独立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大家都主动进行帮助，但被帮助的同学却坚持只接受启发提醒，不希望越俎代庖。学生会和卫生室大夫每天都进行宿舍晨检，班主任熄灯时还要查铺。星期六课后学生离校须事先请假，并且必须在星期日晚自习以前返校。

学校文体科技方面的活动十分丰富。歌咏比赛、口琴比赛、棋类比赛、球类比赛、拔河比赛经常举行；田径队、球队、口琴队、合唱队、曲艺队、演剧队、吹号队、腰鼓队等样样俱全；科技和学科研究小组经常深入到班组之中，公开展示他们制作的各种教具、乐器和学习工具等。春季郊游与下乡宣传相结合的活动，使不少在城镇住家的同学认识了乡村，能分辨小麦与小葱、韭菜的差别。秋季旅行与参加秋收劳动相结合，帮同学们增长了从事农业劳动的技能。学校组织的这些活动，提高了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

学校经常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去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土地改革、开国大典、镇压反革命、节约救灾、宣传婚姻法等，每逢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活动，学校都出动鼓号队、秧歌队、腰鼓队开路“打场”，并在中间穿插一些口头宣讲。当时，良乡的老百姓都公认，良乡中学的师生是最进步的社会力量。

学校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以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投入到政府各部门和各界各系统兴办的为群众谋福利的各项事业中来，例如，修桥筑路、植树造林、清扫街巷、慰问烈军属、慰问孤老户、节日大联欢等活动。其



中影响较大的有：1949年春，在翻身农民报名参军的热潮中，良中演出的歌剧《宝山参军》一时成了轰动全地区的“名角儿戏”，十里八村的都携儿带女赶到城里来看演出。又如，为建国一周年庆祝活动赶排的大合唱《东方红》和为发动群众搞好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排演的大型歌剧《王秀鸾》，也都是演了一场又一场。至于随时赶集上街搞小型宣传活动，更是按照政府的安排和群众的需要“随叫随到”。以上活动大都是课后排练，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演出，基本上不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所以，乡亲们都说良乡中学的领导和老师是全才，学生也不仅是学生队，还是宣传队、工作队。

北岳三中在平西解放区组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华北解放战争和解放后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良乡中学这座注入红色基因的革命大熔炉的冶炼和反复锻造，一批批优秀学子被输送到各条战线。



《燕山石化报》的前世今生

王忠胜 王志芳*

《燕山石化报》已经办了42年。自创刊到2021年底，已发行了3995期。它虽然由燕山石化公司党委主办，但也报道燕山地区的新闻，是燕山石化职工和燕山地区老百姓最喜欢的报纸和最主要的信息来源。

一、《东炼会战通讯》在大会战中创刊

《燕山石化报》的前身是《东炼会战通讯》，创刊于1969年5月15日，隶属于东炼会战指挥部。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保证首都燃油供应，国家决定在北京建设一座大型炼油厂。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战备要求，最终厂址选定在周口店北部的坟山村。炼油厂后来定名

* 王忠胜：房山区燕山工委机关党委原书记，二级调研员
王志芳：北京燕山中海建安公司企宣经理，燕山文学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为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简称“东炼”。1967年5月，兰州炼油厂的首批建设者进入坟山村，东炼建设的序幕就此拉开。

1968年10月，北京市决定将东炼建设列为向国庆20周年献礼的项目，也就是说东炼一期工程的三套炼油装置和相关配套系统都要在1969年10月1日前建成投产，并且达到年加工原油能力250万吨的目标。于是，东炼建设工地掀起了大会战的高潮。

为了让上级部门和参加东炼大会战的14000名职工及时了解东炼大会战的进展情况，记录和歌颂建设者们艰苦创业的先进事迹和“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会战指挥部创办了《东炼会战通讯》。

《东炼会战通讯》是燕山地区、也是燕山石化公司历史上最早的报纸，四开四版，黑白铅印，有图有文，不定期出版，每期印刷5000份，发行到参加大会战的各单位，直至基层班组，同时也上报北京市政府和石油部机关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当时《东炼会战通讯》编辑部有编辑、记者七八个人，负责的是一名军代表，还有两位东炼的转业军人和三位中国人民大学支援东炼大会战的大学生。其中有一位摄影师叫张从密，他来自北京石油设计院，1967年就随勘探队来到坟山村拍摄原始的地形、地貌，提供给中央领导做决策使用。之后，他又为整个会战工程拍摄了几万张照片，现在留存的几千张珍贵底片已经成了燕化公司宝贵的历史遗产。

随着一期期散发着油墨清香报纸的出版，“东炼大会战”



的全貌，通过引人入胜的消息、评论、通讯、故事和新闻照片，全景式地展现在广大会战职工面前，这对于企业学习大庆，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激发工人群众干劲、努力完成奋斗目标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经过全体会战职工的艰苦奋斗，东炼一期工程的三套主要炼油装置和配套工程如期在 1969 年 9 月底前顺利建成，并一次投产成功，向国庆 20 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1969 年 10 月以后，《东炼会战通讯》改为每周一期，定期出版。报纸的主要任务是报道东炼的生产情况和二期工程其它几套炼油装置的建设情况。

1971 年 7 月 20 日，北京石化总厂接管了《东炼会战通讯》，报纸改名为《会战通讯》，报道范围扩大到总厂所辖各单位，同时覆盖了整个燕山地区。1971 年底，因受“9·13”事件影响，《会战通讯》停刊。

二、《燕山油化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问世

1975 年 10 月，经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北京石化总厂领导决定恢复《通讯》的编辑出版，后定名为《石化通讯》。先是一个 16 开本的杂志、每期 12 页，印刷 5000 份，发至总厂领导和机关各处室、生产厂车间和班组。《石化通讯》开始不定期出版，后改为每周一期。

1978 年 6 月 29 日，《石化通讯》由周刊改为周报，四开四版，



黑白铅印。1980年5月9日，《石化通讯》正式改名为《燕山油化报》，依然是每周一期，四开四版。

1979年3月8日，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更名为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石化通讯》改为《燕山油化报》。《燕山油化报》创刊后，隶属于总公司宣传处，组织机构叫通讯组。

1983年6月，《燕山油化报》编辑部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副处级单位，由公司党委直接领导，何绍改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编辑。编辑部下设新闻科、专栏科、后勤组。

1985年7月以后，《燕山油化报》由每周一期改为每周两期，依然是四开四版，但是每期报纸发行量已经达到10000份。

1989年9月，何绍改任公司党委宣传部长，王雨华被任命为《燕山油化报》的第二任总编辑。

三、《燕山油化报》的大发展时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燕山油化报》的大发展时期，也是最辉煌的时期。无论从版面编排到内容选择，从稿件质量到印刷效果，从报纸的发行量到对读者的影响力，都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从1991年3月起，《燕山油化报》由铅字排版、活版印刷改为电脑激光照排和胶版印刷。由于印刷技术的改进，使报纸版面的整体效果大为改观，尤其是照片的印刷质量得到很大提高。



1992年1月后,《燕山油化报》虽然还是每周两期,不过经常会根据企业发展和宣传需要,开始不定期由四开4版增加到四开八版,每期报纸的发行量也增至20000份,每年出版100期左右。

1993年春,按照公司党委的要求,《燕山油化报》通过燕山地区60多个居委会实行送报入户,发行量曾达到30000份。

1993年6月,《燕山油化报》编辑部购入北大方正的电脑录入和排版系统,成立了电脑激光照排机房,独立完成报纸稿件的录入、排版、出样、定版业务,基本实现了数字化一条龙作业。

1994年以后,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由十几人增加到20人左右,不仅采编分开,内部机构也改设为记者科、编辑科、展览科和办公室。

1998年1月以后,《燕山油化报》开始形成了周二八个版、周五四个版的固定模式,有时还出增刊,每年出版总数在100期以上,发行量一直维持在20000多份。

那个时期,每当报纸出版时,都会有几十位热心读者挤在编辑部门口自取报纸,就像现在的“追星族”等待着新一期的《燕山油化报》。

20世纪90年代,每逢燕化公司举行“四烯大检修”,除维持报纸的正常出版外,都要抽调编辑记者和宣传部同志及基层骨干通讯员组成临时小组,编辑出版每天一期的《燕山油化报·检修快报》。



《燕山石化报》的版面设置基本是：一版要闻版；二版综合新闻版；三版综合专栏版；四版文化副刊。报纸凡出八个版时，多出来的版面大多数是专版，如“燕山摄影专版”“燕山美术书法专版”“燕山社区新闻专版”“长篇通讯专版”“深度报道专版”等。

燕化公司经理办主任郭玉辉曾称赞说：“《燕山石化报》有十大功能，这十大功能是：党政领导的喉舌、职工群众的知音、群众监督的工具、干群疏通的桥梁、政务公开的窗口、传递信息的纽带、惩恶扬善的武器、培养人才的摇篮、燕化历史的记录、职工生活的参谋。”

20世纪90年代中期，整个新闻界都在呼吁要重视新闻照片的拍摄和采用，强调报纸要图文并茂，照片不仅要多，还要大，要让读者逐步进入“读图时代”。《燕山石化报》除正常出版会采用多幅照片外，还会在增加的四个版中专门编辑“燕山摄影”专版。仅1998年就编辑出版了24个摄影专版，全年报纸共刊登照片1197幅。除了照片数量，《燕山石化报》刊登的照片质量也有口皆碑。

2001年7月，燕化公司改革，《燕山石化报》编辑部人员大幅度减少，报纸每期印数也下降到13000份。

2002年9月，公司实行机关全员竞聘上岗，编辑部人员减为10人。

2003年元月，《燕山石化报》从公司机关剥离，报纸每期印数下降为10000份。由燕山工委宣传部与《燕山石化报》



编辑部共同编辑。

2019年,《燕山油化报》划归公司行政事务中心管理,编辑部工作人员和报纸的印数进一步减少。《燕山油化报》、包括它的前身《东炼会战通讯》《会战通讯》和《石化通讯》,既见证了又真实记录了燕山石化公司从起步到发展再到腾飞的光辉历程,为服务燕化公司职工和燕山地区百姓作出了突出贡献。

注:本文口述者王雨华,燕山油化报原总编;整理者王忠胜、王志芳。



顾册村轶事

杨亦武*

顾册村，属房山区城关街道。聚落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考古部门先后在顾册村村东和村北发掘两处汉墓，可见早在汉代顾册先民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

顾册村地处大房山山前平原，土地肥沃，众水奔流，易耕易牧。这里又是东驱良乡、燕京，南达涿易而江南，西走易水而沿晋陕的交通要道。自古农业发达，经济繁荣，在这一带村落中，无与伦比。顾册村北，河流交错，地势狭窄，既不易居也不易耕，再北为山地石田难为生计。所以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顾册村北的今房山城一代，寂无人烟。直到金代，在大房山的九龙山建皇家陵寝，今房山城所在为入陵门户，为守陵和祭陵，到金代晚期的大定二十九年（1189）才在此起板筑城，设置立县，先叫万宁县，后改奉先县，元代改称房山县。顾册村名，在这一带也是最早的，而且有据可查。金明昌五年（1194）苏

* 杨亦武：原房山区政协专委三室副调研员



敬安《大金大房山灵峰寺之记》载，“旧有庄产别业，凡数四区：寺南之西乃长沟庄，右与禅庵水邻。东临鹿门峪，栗林园圃外，系藉廊宇尚存。正南固册里，寔庄土之墟落。”这段记载表明，至少在八百年前的金代，固册之名已经存在。古时，以村名为里名，先有村名，后有里名。固册村先于固册里存在，固册村的出现不晚于金代，抑或辽代已有此村。这就是今顾册村的前身。

金代以后，尽管顾册村沦为县城南郊，但其繁华的形式并没有改变，此后的八百年间，顾册一直商号林立，商贾云集，与古城房山争峰斗胜，远近村落未望其尘。顾册村的小集、前后街自古为商业重地，座商奇货闻于地方，到民国年间，顾册村仅此一地，就有商号店铺 30 余家：肖家机织补袜子、王家棺材铺、李家典当铺、梨明村杂货、裕贤堂百货、徐家首饰楼、王家肉铺、田麻铺、理发馆、纸活姜、谷豆腐房、赵家扛罩房、王家扛罩房、张家杂货铺、王家药铺、济生堂药铺、德裕生（李家大铺子）、石家小面铺、后五寿春堂药铺（邸家）、邸润斋染房、王家小吃、北杂货、张家小铺、赵家麻绳铺、段家药铺、段家小铺、永兴布庄、侯豆腐房、永泰商号等。一个村，有如此众多的商号店铺，不亚于一个繁华的商业小镇。

村中有关帝庙、五道庙（3 座）、驾宫、河神庙、老母殿、菩萨庙，北极玄应观、玉皇殿，西为丹天窑祖兴云殿、白衣庙等寺观 12 座。一个村，有这样密集的寺观，在房山地区绝为少见。



顾册村庙会，远近闻名，以三月庙为最。三月庙以北极玄应观为中心，除宗教民俗活动外，商业活动十分活跃。观前戏楼一连几天的大戏，日夜不停。在戏楼西侧为杂货摊点，经营饮料、玩具、柿饼等，同时经营饭店、炸油饼、小吃。牌楼与影壁之间经营梳头用具。其西是娱乐区，有说评书的、驯兽的、套圈的、拉洋片的。影壁和山门之间是耍货摊，主要经营儿童玩具和贡品。戏楼南的后街，每逢三月庙，整条街形成集市，主要经营农家生产生活用品。自东而西摆着叉子、帚把、石碾子、木耩耙、铁犁、苇席、品织器具。小集侧摆放经营荆条筐篓、绳套、皮货等。每逢庙会，远近十里八乡，都前来赶庙。或是拜神祈详，或是看戏娱乐，或是买卖交易。当顾册村走进新的时代，三月庙便成了顾册人难忘的记忆。

一、沿街商铺

顾册村地处房山城南郊，东通良乡、南通涿州，西南通涿水、易县，历来是物资交流的理想集散地。清末民初，这里商铺林立，商业十分繁荣，不亚于房良地区的商镇。

清康熙三年（1664）志书记载：房山城每月四集，四街轮市。逢四东街；逢七西街；逢九南街。附近数十村都来赴市。顾册与城关咫尺之遥，商业信息、商人往来、商品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时的商人之中多为晋商即山西商人，后晋商日落，本地商人日起。交易中的大宗商品以粮为主，次为杂货。



顾册商人，不但每月参与房山四集，本村也有商品集散之地，村里人称为“小集”的胡同位置在今村中小亭的南边，商品居多，小作坊居多，非常热闹。

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顾册小集商铺由顾册街心小亭向南，有一条长三四百米的小集。民国年间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条街上做买卖的商家多达三四十户，由北向南依次是：路西是：王家杠罩房、张家杂货铺、德裕生李家铺子、石家小面馆、“邸润斋”染房、王家小吃店、北杂货铺、裕荣堂布铺、张家小铺、赵家杠罩房、李家麻绳铺、段家药铺、段家杂货店等。路东自北向南是：王家药铺、济生堂药店、永泰公商店、李家粮行、侯家豆腐房、永兴布庄、段家商店等。每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和购物的百姓，把本来就不宽敞的小街拥挤得水泄不通。由此，村里人便自然而然地把这条热闹的小街叫“小集”了。后街由东向西依次是：肖家机织铺子、王家棺材铺、李家典当铺、“裕贤堂”百货店、“黎明村”杂货店、徐家首饰楼、王家肉铺、田家麻绳铺、赵家杠罩房、老谷家豆腐房、理发馆、姜家纸活铺等。1952年，国家对私营商业实行限制、利用和改造政策，私营商号逐渐减少。1955年后，公私合成立供销社，个体商号停止营业。

当铺李——据传是晋人，名号不详，其典当行始于明末，兴于清。当时铺面极为气派，名贯房山。顾册前街两侧均为其经营地盘。经营项目繁多，无所不有，无所不当。民国年间，一场天火，整个当铺烧得荡然无存，当铺也随之败业。



斗子李——乃是房山、北京一带经营土地和粮食的乡绅巨商。家族拥有土地 4000 余亩；房产 1600 余间；马车 30 多辆；骡马上百匹；长工百余人，短工无其数。相传，北京、房山、琉璃河，顾册本村以及顾册周边的双孝、支楼、东坟、北市、南关、云峰寺、下坡子、夏村等都有“斗子李”的土地，其中琉璃河的李庄村就有斗子李的良田 500 余亩。北京广安门外有十八家粮店，牛街整条街的店面都归李家经管。

烧锅李——为顾册酿酒和经营酒业的著名老字号商户，兴于民国初，酒业批发零售至良乡、琉璃河、码头一带，因七七事变败落。

黎明村和同意兴——为村中两家杂货店，生意也很兴隆。黎明村的店主张金明，同意兴店主为关霖，两家商铺主要经营些群众生活需要的烟酒茶糖、针线杂货，学生用品；还有绿豆糕、蛋糕、月饼、缸炉、江米条等点心。1955 以后公私合营，村里有了供销合作社，个体商号随之消失。

寿春堂——药房。掌柜胡荣颜，坐堂大夫有张振清、李维平、张荣、邱润斋、赵利民等。

济生堂——药房。掌柜和坐堂大夫是人称小王先生的王振刚。

以上两个药房都是中西医兼具，既会中医把脉，也可以打针输液，做简单的外科手术。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村里有了合作医疗，私人医生和药房逐渐退出。

粮行——李汉章开的德润升是专门经营粮食的粮行。李雅



怀开的裕生堂既卖粮食也卖其他杂货。

牙行——俗话说“车、行、店、脚、牙，没罪也该杀。”是说这些行业中多有欺诈行为。所谓牙行，就是经纪人。这种经纪人主要是在大牲畜交易中，在各种粮食交易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他们在买卖双方不太熟悉市场行情的情况下，伸出手在双方的袖筒里变换着手指，不停地摸来摸去，暗示出价格。经过讨价还价，直到最后成交。他们赚取之间的差价。段永瑞是比较有名的经纪人，人称“段一刀”。

脚行——即用牲口搞运输。蔡老二兄弟两家里养着些毛驴、骡子，赶牲口从长沟峪往县城附近驮煤，挣些辛苦钱养家过日子。

粉坊——即凉粉。白文广家做凉粉，是夏季最受欢迎的吃食，可以降温败火，孩子大人都爱吃。

油坊——王学余、王金魁父子（名字、谁大谁小再弄清楚）做小磨芝麻香油，名声波及十里八村。

醋酱坊——李福臣家开过醋酱坊，用黄豆、小米做醋和酱油。

杂面铺——白土豪家用机器做杂面。

豆腐房——前街老侯家，小集的侯九江，后街老谷家是有名的三家豆腐房。做豆腐历史长，质量好。曾供应县城里的饭店和政府机关。解放后，侯景风家也做过很长时间的豆腐。

磨面房——一般老百姓吃的米面都是自己家推碾子或者推磨，白文广、彭俊凯、洪书元家开的磨面房专供灰窑、煤窑用面，有时也供应县里机关食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村里有了电



磨，1984年村里有了面粉厂。

布行与染坊——斗子李在村里开过布行，从外地购进各种布匹在村里经销，规模比较大，有五间门市，五间库房，还把买来的素布染成黑、白、蓝等各种颜色出售，据说原销到山西、河北等地。

首饰铺——徐万生的首饰楼名为“荣华楼”，还有胡荣颜的“寿春堂”也兼营首饰。主要做些手镯、戒指、耳环之类的饰物。

黑白铁——彭珍手巧，用黑白铁做的水桶、水杓子、铁壶十分受村民的欢迎。

打麻绳——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中都免不了要用各种麻绳。麻绳分苘麻绳和线麻绳两种。王恩荣、王恩元、王福家打的麻绳结实耐用，很受欢迎。

编席篓——编席和编篓是两码事。张二、张三（张来顺的父亲）兄弟擅长用秫秸（高粱秆）破成细篾，编席篓，供农民家里盛粮食或杂物。而来自白洋淀的李长明的父亲则擅长用芦苇秆破成席篾，编成炕席，那是每家老百姓的必需用品。

做花炮——顾册村做花炮有很长的历史，在京津地区都很有名气。后街的彭钧、彭江、彭富三兄弟的花炮制作有规模、有水平；前街的彭林、彭奇也是做花炮的高手。每年春节前后，到顾册村买花炮的人络绎不绝，正月十五放盒子，八卦九莲灯，菊花吐艳、猴儿捅马蜂窝、天女散花等焰火把夜空映照得火树银花，更让顾册人出尽了风头。

刻图章——肖志刻章远近有名。他会用楷、隶、篆各种书



体给人刻章。他后来在县城钟表刻字社工作，是当时房山县唯一有资格刻公章的人。

修钟表——专业修钟表的是米万钧。此人多才多艺，曾经在村评剧团演出的《刘巧儿》中扮演王寿昌，惟妙惟肖。公司合营后到房山县城钟表刻字社工作。

瓦匠——顾册村里干瓦匠的人很多，名气比较大的有武祥、肖振荣、姜振荣、崔振河、刘才、武国铨、肖真、肖月等人。武祥，因为承建了房山北关的贸易公司而出名。崔振河，因为在周口店“地质部”盖房子而名声在外；村东的大部分民房都是他担纲建盖的。武祥曾带出了很多徒弟。董顺也是瓦匠，后来当了大队长，就不干瓦匠了。武国铨，因为承建瓦井化工厂而出名。姜振荣，曾为县政府机关盖房子。还有陈兴、陈贵等人。这些瓦匠还因此带动了村里的副业生产，增加了集体和社员的经济收入。

木匠——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有杜茂华（段汝济的师父），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去世。任永茂和任永平兄弟，还有任凤山，他们盖房做大木件，为村民打家具手艺都很好。特别具有传奇色彩的是“枣儿糕”，本姓张，住在顾册西沟，许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记住了他的外号。据说“枣儿糕”心灵手巧，手艺精湛，曾为长育小学和县政府盖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木匠还有石秀、王贵，合作化之后比较有名的木匠有王振清、何金梁、段汝济、彭俊生、任凤桐、何金臣等。

铁匠——小集郑宝华、郑宝山的父亲郑德明，人称小郑子。



家里有红炉，打造镰刀、三齿镐等农具，还带了一些徒弟。东头炉灰坡李文斌的父亲李生，专钉马掌，有时也修打农具。铁匠还有杨迷糊等人。

鞋匠——肖宽、王希禄为著名的鞋匠。肖宽的反正绗鞋远近闻名。肖汝常，会织洋袜子。

棚匠——即糊顶棚的。那时候日子穷苦，不讲究装修房子，躺在炕上数椽子是很常见的事情。日子稍微富裕一些的人家或者结婚娶媳妇要布置新房，就要请人糊顶棚。姜士忠就是专门为农家糊顶棚的。

小炉匠——那时候生活穷苦，锅碗瓢盆坏了舍不得扔掉，小炉匠的主要业务有两类：一是铜锅。谁家的铁锅裂口了，小炉匠用火补的办法使其修复再用；二是铜盆铜碗，用特殊的细钻在盆碗的裂缝处，打两个眼，钉上铜子。所谓“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的谚语就是说他们的。张国忠就是专门修理破旧的锅碗瓢盆的手艺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为众人服务，为自己谋生。

厨师——民以食为天，所以厨师又称为大师傅。老百姓婚丧嫁娶办大事，都要请厨师。郑德海、唐四爷、王景山、李肥子(李顺)是有名的厨师。郑德海还曾经到县城里的“北海居饭庄”“鸿顺栈”“东来顺”当过厨师，他抻的“一根面”远近闻名。

裁缝——陈金科，陈金贵兄弟，还有肖有财。会裁剪男女老少各种衣服，用缝纫机做的“制服”，在当时很是时尚。陈金科曾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专门做裁剪。



理发——最有名的要说尹大、尹二兄弟，即尹玉山、尹玉旺。他们不但理发的手艺好，还会按摩、推拿、甚至会脱臼接骨。尹大有一个女徒弟石玉兰，她后来在村东头开了理发店。

杀猪——20世纪农村几乎家家都养猪，一是为了到腊月过年时宰杀，全家人可以饱餐解馋；二是卖了猪肉，也是一笔收入；三是猪粪可以作为上好的肥料，使庄稼丰收。因此哪个村都少不了杀猪的，有的人是业余，有的则是专业的。顾册村的张德海、刘贵、赵二爷都是杀猪的好手。他们支起大锅，抄起家伙，手脚麻利，把一头猪里外都收拾得干净利落。

炸麻花——谢立富做的炸麻花又香又脆，前街后街都愿意到这来买。

豆腐脑——周瑞的父亲，崔印的父母都卖过豆腐脑。

炸豆腐、炸丸子——孟财家的炸豆腐、炸丸子可以放三天不散不坏。

熏田鸡——即熏烤青蛙，下酒的美味，村里有人好这口儿，陆德才用熏得焦黄的田鸡满足了“市场”需求。

做冰糖水——夏季炎热，那时候没有什么雪糕、汽水等冷饮，张福增能做出五颜六色的冰糖水，惹得孩子大人都喜欢。

冰糖葫芦——高金成、高金山兄弟常年做冰糖葫芦，孩子大人都喜欢，他们还兼卖柿子、梨等水果。

棺材铺——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多实行土葬，所谓“入土为安”。王贵家（王振清、王振海的父亲）专门作棺材，按照薄厚不同分为四五六、三四五等几种类型，最差的一二三叫



“狗碰头”，形容棺材板很薄。买什么规格的棺材，就要看买主的财力了。

杠房、吹鼓手——过去，农村有大办红白喜（丧事亦称白事）的风俗。杠房和吹鼓手就是为红白喜事服务的。结婚喜庆要抬花轿，花轿也分为很多种，有8人抬的，有16人抬的；办白事也同样热闹，棺材外面还有棺罩，最多的要24人、甚至32人抬着。尤其是老丧，大办几天以后，许多当事人也没有了悲戚的神色。杠房与吹鼓手往往是一块牌子，两套人马。杠房里备有各种花轿、棺罩。乐器的种类也很多，笙管笛箫，唢呐云锣，一应俱全。吹鼓手们演奏起来，十分卖力，半条村子的老街坊旧邻居都来看热闹。赵瑞家的杠房远近有名，张亮、张才是搭灵棚的好手，张廷福的唢呐吹得最好。

做纸活——这纯粹是为办丧事服务的行业，至今不衰。为了让逝去的亲人到西天后能够生活得更舒心顺畅，子女亲朋都要在一些主要的日子糊一些纸的物品以寄托哀思。比如，下葬的时候要有童男童女，陪伴老人不寂寞。还要有车、马、牛等代步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还有糊电视、冰箱、小轿车、麻将牌的。下葬五个星期那天要糊伞，六十日要糊船，顾册村子大，几乎每个月都有人驾鹤西游。所以，糊纸活的生意也不错，姜义、李江两家不但会糊纸活，还画影壁，画挑檐，甚至到庙里画壁画。

大车店——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京周公路尚未修通，汽车很少，交通运输主要以牲畜为主。顾册村地处县城附近的



交通要道，开设车马旅店是很自然的事情。村里的大车店主要有两家。后街王度的大车店以养骆驼为主，那时候从口外（张家口以外）运煤多是骆驼，往返要好几天。村东于仲江的大车店规模较大些，往来车马客商在这里住宿、打间（停车吃饭）的比较多。他的店里卖的豆腐脑也挺受客人欢迎。

拉洋片——这是今天已经绝迹的一种民间娱乐艺术，类似幻灯。艺人把各种景物或者人物画片装进一个箱形的装置里，箱外面有几个小孔。孩子们把眼睛对准那个小孔，就可以看到许多新鲜的画面，如桂林山水、黄河长江、孙悟空、猪八戒等，那艺人手中敲打着锣鼓，口中念念有词，吸引了许多儿童前来观看。刘二就是靠拉洋片挣点孩子们的小钱，养家糊口。刘二有时也搞玻璃球打奖，顾客给了一定的钱，然后玻璃球顺势滚下来，碰着什么就奖给什么，碰不着钱算白花钱。

货郎——俗称卖花的，柳某最为有名。以自行车为载货工具，用拨浪鼓招揽生意，主要卖针头线脑、小孩儿玩具等家庭日用小商品，主要活动在本村及附近村子。

张麻衣箩——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名词是啥玩意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农民要把粗糙的粮食经过碾子或者石磨，碾磨成面或者玉米糝子，再用面箩筛过之后，才能做成各种食物。面箩一般是圆形网状，分为好多种，有白面箩、豆面箩、二细子箩等。麻衣箩是比较粗的一种箩。杜珍是张箩的手艺人，张麻衣箩是统称，其实他会张各种各样的箩。

做木轮马车——1937年七七事变前，农村很少有胶皮轱



辘马车，多是用木头制的车轮和辐条，外面钉一圈铁皮铁钉。韩广银、刘海周两家做的木轮马车享誉十里八村。

修自行车——20世纪40年代以后，自行车在农村逐渐多了起来，修自行车也成为一个行业。石楼的杜老石在后街开的修车铺专门为附近有自行车的人服务。

当年，还有一些有名的村商小贩儿，如：曹毛儿冰窖，曹家宅东是一个大坑，冬天结冰，曹毛儿凿冰藏于冰窖，来年盛夏出售。大坑西北角的龙王庙即为此人出资兴建。前街武秃儿，子然一身，会做风车，集市上或沿街叫卖，孩子们非常喜欢。

毛顺，打磨。老何家，开木场子。谷顺，经营支炉子、砂锅。彭俊凯，擀毡子。

二、旧时庙会

顾册村的庙会节日有三个。农历二月十九日菩萨生日庙会、农历三月初三春会、农历六月初六日道士晒袍会。

二月庙

农历二月十九日菩萨生日会，在白衣庙举办。届时在白衣庵庙前开阔的地上，搭上席棚，支上几个大灶台，安上大锅，锅上放压饴饹床。和好了面，烧开了水，人一到就开轧。

这个活动简单明确，即全村老幼为庆祝南海大世菩萨生日，自己带上碗筷，到庵前排上长队领轧饴饹吃，一碗不够可再盛。



从早上开饭一直延续到下午。轧饹饹是纯白面的，豆腐条或油条打卤，码子是绿豆芽或者是大白菜等。这一天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扶老携幼全家出动来吃。附近外村的农民闻讯赶来也让吃。

当时本村有个著名的拉面手叫郑德海，还有个叫赵凤山的都在外面饭馆里耍手艺，这天也特意赶回家，为老乡亲们献艺。

这笔费用的来源一靠庙里的布施，再者是村民的捐助。有钱的出钱，有面的出面，有菜的出菜，不够时由当地商号和本村财主自愿分摊。

三月庙

在玄应观举办。自农历三月三日三月五日，为期三天，是房山境内规模最大、最热闹、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庙会。其内容一是进香朝拜，二是走会演戏，三是贸易交流。这三天进香者上供朝拜的人全部拥进玄应观内及周边的寺庙里，人们摩肩接踵拥挤不动，香火烟雾弥漫了整个寺观的上空。最虔诚的信徒从玄应观大门影壁处六十米远爬进来，背上驮着黄表，由两个道士陪伴，还要爬七层台阶。进殿后进香上供叩头，反复祷告，有的为父母求健康，有的为儿女求前途，还有的求好日子，求早发财，求孩子等等。这三天是观里老道们最繁忙的日子，所有的庙门昼夜敞开接待香客，香火不断。

每次庙会还要走花会。花会最多的是民国二十六年，有十三四道，都是十里八村的。据老人们记忆，有房山南观有杠箱会、铜锣会，有长沟峪的高脚会，有娄子水的高跷会，周口



村的少林会，支娄的大鼓会、牛头会，吉羊的叉会、五鬼捉刘氏，大次洛的叉会，天开的太平鼓子会，苏村的小车会，下坡店的旱船会等。花会大部分是自愿来的，小部分是邀请的，都没有酬劳，甚至连饭都不管。

此外庙会上还有两台大戏对唱，一台是本村剧团在火神庙的月台上唱，全是评戏，再一台就是琉璃河兴礼的剧团在本村戏楼上唱。戏楼前搭上席棚，留下出口卖票入场。节目很丰富，文武戏都有，如有《继母娘打孩子》《五鬼捉刘氏》都是哈哈腔调。还有京剧、河北梆子。主要戏目有《打金枝》《大登殿》《蝴蝶杯》等。看戏的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看什么就去看什么。白天没工夫，可以看夜场，看到精彩处常常爆出喝彩声。

庙会上进行物资交流的摊位不下千余个。他们头三天就来占地方、搭棚、或租房做准备工作，卖的货物一应俱全。就以戏楼为中心，东侧是卖杂品的，如卖柿饼的，卖糖葫芦的；戏楼西侧是卖小吃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说书的。说到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停下向周围群众敛钱。戏楼北侧搭长棚摆上长桌子是茶舍、饭店。跑堂的报着各种茶名，吸引逛庙的来吃。再往北是妇女用品，如梳子、篦子、针头线脑之类，还有小孩子玩具。玄应观四面围墙上挂上黑绒布，别绢花、绒花卖；戏台西北是摔跤的、耍猴子的、训熊的、修脚的、卖艺的、套圈儿的，还有跑马戏的，拉上围帐。艺人们的马上功夫，引起阵阵喝彩起。还有卖炸货的。戏楼往南是卖编织的，有背筐、绳套、马车上的用品，还有各种农具，如犁、耩、盖、耙、锨、镐、锄、



叉子、筛子、簸箕、扫帚。再往西还有卖苇席、竹篓炊具、炉具等等。三条大街车水马龙，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及各种声响，喧嚣鼎沸，不绝于耳，热闹非常。

属民国二十六年的庙会最火。这年庙会顾册村所有庙宇的各路神仙雕像被重新粉刷一新，这次庙会热闹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庙会。

庙会的组织由村里成立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庙观住持、村政、大商号掌柜的组成。村里收一些占地费、管理费，庙里收布施、香火费等。管理委员会还负责接待、治安、巡逻等事项。

三月庙市远近闻名，但气势之庞大，参与人员之广泛，商业品类之繁盛令人叹为观止，是房山一带乃至河北省与之接壤乡村中最热闹的。从三月初一至初五，每天都是人山人海。

民国时期顾册庙群建筑还相当完整，庙群之中，当数北极玄应观最为壮观，此观与白衣庵、戏楼、牌楼，各具风格又浑然一体。周边近百里的乡镇村民都前来赶会，人们参与庙会除进香祈祥、观赏花会外，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逛集串市，互通有无。

顾册后街几乎成为一条商业长龙，叫卖的，唱卖的，保价的，谈生意的，打招呼的，侃大山的，不绝于耳。整个市面基本可分为七大类：干货坚果区有核桃、栗子、棒子、花生、瓜子、杏干、瓜干、柿子干等应有尽有；蔬菜区有大白菜、大红萝卜、白萝卜、土豆、白薯、胡萝卜、心里美、干豆角等样样俱全；肉类区有猪肉、羊肉、红豆腐、羊杂碎、猪羊头肉、猪羊蹄子



等香气扑鼻；小吃区有炸麻花、炸油饼、炸花生米、糖炒栗子、豆汁豆浆、茶汤、驴打滚、糖葫芦等调人口味；粮食区内有大米、小米、大黄米、玉米、高粱、黄豆、红豆、绿豆、芝麻、黏米、玉米面、荞麦面、豆面等五光十色；农具区有犁、耩、耙、锨、镐、锄、镰、麻绳、鞭子、牲口套、叉子、鞍子、背篓、背筐、扫帚等；其他类有木匠、瓦匠、石匠使用的各式工具，如锤子、锯、镑子、铲子、瓦刀等五花八门；还有女人专用的雪花膏、花布、首饰、胭脂、针头线脑、头巾手绢等。

六月庙

农历六月初六道士晒袍会，亦在北极玄应观举办。这个节气天气干爽，届时北极玄应观里的老道们出来晾晒道袍，玄应观门外拉上几道绳子，道士们把收藏在库里的所有道袍、道服等全都拿出来放在绳子上晾晒。

然后，所有师徒们拿着笙、箫、管、弦、云锣等乐器在太阳底下弹奏优美的乐曲，尤其是玄应观里的云锣最动听，乐声能传出三四里之外。这个音乐会常常把附近百姓招来欣赏，围得水泄不通。

在晾衣之前，他们先到火神庙后面的冰雹殿里给冰雹神烧香、跪拜、祈求给个晴朗的好天气，同时也为百姓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个庙会实际上是北极玄应观老道们举办的音乐演奏会。



我与浩然老师的一次聊天

赵思敬

自从爱好上了文学，浩然就是我敬慕的作家之一。1991年11月26日至27日，经燕山文化馆陈予一和王德恒牵线，北京作协评刊会在燕化机械厂招待所举行。当时，浩然是北京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主席。会议期间，作为《燕山油化报》的副刊编辑，我有幸参与其中，并有机会与浩然老师一起聊天，请教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使我受益匪浅。现根据日记和回忆将有关内容记述如下，权作一段文史资料。

我与浩然老师拉近距离，开始于晚饭前，经陈予一介绍，只是象征性地与他握了握手，并点头问好。他一笑说，你好。进入饭厅后，王德恒让我与浩然坐在一桌，隔着陈予一与浩然老师相对。趁服务员还没上菜，我对浩然老师说：“1976年夏天，在中山公园音乐厅，我听过您讲述创作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的经验和体会，那时，您留着平头，抽着烟卷，讲述西沙见闻，在军舰上构思小说，伏案写作，门外还有战士站岗的事，给我印象很深。”听了我的话，浩然打量了我一眼，轻声



说：“为了那次讲课，我准备了好长时间，讲课时心情很紧张。不过，从那以后不长时间，我就倒霉了。”这话里有话，是指《西沙儿女》（奇志篇）的创作完成时间不久，由于“四人帮”的牵连，这部小说和他本人就受到了批评。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在封镜前被迫下马。

本想与浩然拉近距离，没想到我的话触动了他的伤疤，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好在浩然打破了尴尬，他转过话题笑着问我：“你是哪一年出生的？”我回答：“您到《河北日报》当记者那年我刚出生。”这话可能只有我和他能听懂，因为22岁的浩然1954年在《河北日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两千块砖》和《探望》两个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后，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和关注，很快被调到《河北日报》社当了记者。我的回答显然引起了浩然的兴趣，他知道，我不是一个普通的读者。脸上露出了笑容，接着问：“你老家是哪的？”我一笑说：“我姥姥家是蓟县的，我奶奶家是宝坻县的。”他伸过头来急忙问：“蓟县哪个乡的？”“下仓的。”“宝坻哪个乡的？”“北潭的。”“这两个人地方我都去过。”在这一问一答中，我与浩然的乡情贴近了。因为，浩然的祖籍是宝坻县单家庄，10岁丧父后，随母亲回到蓟县王吉素村姥姥家落户，12岁时他母亲去世后，从此，他在蓟县生活了很长时间，并在那里入党，参加工作。这些情况我是听老家的乡亲们闲谈中说的。我兴奋地说：“浩然老师，我之所以喜欢读您的小说，主要是想从书里看到家乡的影子，还有印证父母经常说的一些家乡话。”浩然伸出手来与我再一



次握手说：“无论从我父亲，还是从我母亲那边说，咱们都是实实在在的老乡！”

晚饭后，在二楼大厅举行舞会。舞会前我与浩然在一起聊天，这时，燕山文化馆的高明建和燕化动力厂的刘羨启带着相机来到会场，和浩然老师打过招呼，马上加入聊天的行列，同时请人给我们抓拍了几张合影。舞会开始后大约十分钟，人们陆续翩翩起舞。有人请浩然跳舞，他只是微笑摆手谢绝。浩然问：“你会跳舞吗？”我摇摇头：“不会。”他说：“我也不会，咱们不如回屋聊天去吧。”于是，我们俩离开了舞厅。

回到客房，浩然说他正患更年期，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服了药后说：“舞场太闹了，不如在清净地方聊一会儿天。”我向他介绍了燕化公司的大致情况后，又转向了创作话题：“读《艳阳天》时，我对开篇‘肖长春死了媳妇，3年没续上。肖家是两根筷子夹骨头，三根光棍’印象深刻。这个开头与《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联句诗‘一夜北风紧’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这包含了许多谜底，令人遐想不已。”他说：“这个开篇也是下了功夫构思的。”我问：“以您的经验，创作中什么时候最难受？”浩然毫不犹豫地说：“写作的时候是愉快的，但作品发表后，没有人理会，甚至连批评的声音也没有，是最难受的时候。比如，前几年我发了一篇小说。一连三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说好，也没有一个人说坏。就好像我没写一样，真是让人难受。后来，我憋不住了，找人写了一篇评论，心里才算放下这件事。”这篇小说的名字，浩然当时说了，遗憾的是



我现在已经忘了。

在我们闲谈的时候，我从书包里拿出一本《艳阳天》第二部递到浩然老师面前：“这是我收藏的书，今天灯光太暗，明天上午您给我签个字吧。”他接过书惊诧地说：“真没想到，这本书竟然保存得这么好。不用等明天，我现在就给你签吧。”说着，打开书的扉页，用粗钢笔竖排写下“赵思敬同志留念，浩然，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燕山石化公司。”签完字后，浩然老师合上书递给我说：“经过一场变动，难得你还能这么认真地保存我的书。”我说：“这套书是我们团委卖废品时，我抢下来的。后来我在前门大街的中国书店看见处理《艳阳天》，三部才卖六毛钱。”“还有这种事？”浩然显然不知道印刷达到500万册，为他带来无数声誉的小说有过这样的结果。我问浩然老师：“在您发表的作品里，《艳阳天》是不是最好的一部作品？”他仰起头想了一下说：“不能那么说，应该按年代划分说。20世纪50年代的代表作是《喜鹊蹬枝》；60年代的代表作是《艳阳天》；70年代的代表作是《金光大道》；80年代的代表作是《苍生》。”我追问：“90年代的代表作应该是什么呢……”“哈哈，九十年代主要是当编辑，还没有什么好作品。”浩然两手一摊，笑着说。“可不是吗，现在不就开着评刊会呢。”我也笑了。

谈到创作和生活的关系，浩然老师说：“我上过几个月私塾，小学只上到三年级，没什么文化，素材都是从生活得来的，离开生活我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曾读过浩然十多本小说集，



还以他的小说名字写了两副对联，其中一副是：“彩霞方催杏花雨，苍生重唱山水情。”联语集合了四部作品；《彩霞集》《杏花雨》《苍生》和《山水情》。我把这副对联念给浩然老师时，他说，找时间我给你写下来。可惜后来我没及时找他索要。

读浩然老师的作品，我对其中的谚语产生过浓厚的兴趣。本想将这些谚语摘出来，然后归类写一篇论文，但后来一查有关资料，得知当时他已经出版了36部小说集，以个人之力怎么也搜集不齐全了，于是放下了这个念头。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时，浩然的眼睛又亮了：“你现在还有这个打算吗，你要是还想写，我给你提供所有书籍。”我说：“现在，我也是整天陷在编辑文字的琐事中，等将来有时间再说吧。”他说：“那好吧，你什么时候想写，再找我吧。”

从《艳阳天》小说里的贫富差别，我们的话题又说起当下农村的两极分化，我说，现在的农村远不像“张金发”和“刘祥大叔”那种简单的差距了，这种差距的变化带有某种政策性的倾斜。就拿我们石化公司附近的村子来说，与《苍生》中描写的冀东偏僻山村田家庄有许多差异，由于大工业的建设，36平方公里的厂区里还有几个农村，但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与附近的农村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有工农之间的差距造成的，也有政策性特点造成的。一些倒料倒油的村民发了大财，没有门路倒油倒料的个别村民就来偷盗，当地流传着“翻身不忘共产党，花钱全靠炼油厂”的顺口溜。燕化公司附近的这种工农现象和特点值得考察，如果写成小说，会大大丰



富北京地区农村题材创作的形式。他听了苦笑地点点头说：“你说的这些变化有特点，值得搜集，值得写。可惜我已经老了，写不动了，今后要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了。我现在的任务是发现新人，我所编的《泥土文学》丛书，就是要推出北京的文学新人。”

谈到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变化，《苍生》是浩然老师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了。我问这部小说的创作经过，他说，主要是把改革当大背景，表现农村最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命运。小说写了三遍，第一遍是写在笔记本上的草稿；第二遍是边抄边改的誊写稿；第三遍是定稿，前后一共写了三年。这部小说获1990年中国大众文学学会颁发的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还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播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话题从文学说到生活现实，浩然老师告诉我：“自从粉碎‘四人帮’后，自己受到审查，与妻子来到了三河县，后来女儿在那结婚落户。现住在前门大街红十字大楼附近一个地下室，家中有9口人，家庭负担比较重。”低头喝水时，我无意中看了一下手表，天哪，已经10点多了。我们已经聊了三个多小时，浩然老师却没倦意。我知道明天他还要主持会议，急忙告辞。浩然老师送我到门口说：“今晚咱们聊得不错，有时间把你了解的燕化公司与农村特点的这些现象写成小说吧。”握着他的手我点头下楼。

骑自行车往迎风六里家中赶，回想与浩然老师的聊天内容，感觉十分重要。回到家里马上记述在日记中。然后又找出一方寿山石，设计了一个仿秦印的田字格形式，用双刀阴文刻好“浩



然之印”。我觉得，送给浩然老师一方印章，略表敬重之心。

第二天上午，刘羨启把昨天拍的合影照片送到了办公室，我从中选出两张，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连同印章一并交给了浩然老师。他接过印章看了看说：“你昨晚得十二点多睡的吧？谢谢你了。”我说：“您就像田地里的一头耕牛，劳作不止，所以把名字镶嵌在了田字格中。走刀仓促，刻得不好，权作纪念吧。”接过照片，他兴奋地说：“你们干活的速度真快，这是谁照的，把他的名字写上，我让《北京晚报》发了。”我连忙写上了摄影者“刘红艳”的名字。几天后的12月6日《北京晚报》第五版，果然刊发了这张照片。文字说明为：“北京著名作家浩然最近在燕化参加北京市文学评刊会期间，与燕化公司的文学爱好者一起座谈。”虽然这张照片只是我的侧影，许多熟人还是打来电话询问座谈内容。那张有我比较正脸的照片，浩然老师自己保留了下来。

自与浩然老师一别，再也没有机会与他聊天，但我仍然关注他的作品和行踪。听说，1993年6月和1996年11月，他先后两次突发脑昏迷，所幸经抢救脱离了危险。2002年11月，浩然因脑血栓再次复发住院，从此处于昏迷状态，直到2008年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遗体告别式于2月2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举行，骨灰与2006年去世的老伴一同安葬在河北三河市灵泉灵塔公墓。

每次翻看影集中的合影照片，我都想起与浩然老师聊天的那个晚上。如果不写出来，像捧着一团火，有烧手之感。前几



年夏天，我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书架前浏览，忽然看见一本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年出版的《浩然口述自传》，作者为郑实采。蹲下身毫不犹豫地翻看起来。在这本书中居然找到了我与浩然老师的那张合影，只是作者误将我写成盘山文学爱好者了。想想也对，在浩然老师的回忆中，一定讲述过我们聊天的那个夜晚，对于我，他记得更深刻的是一名京东老乡，其次才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房山回族村溯源

许冬梅*

房山区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除汉族以外，全区有 15 个少数民族村，其中有 6 个回族村，分别是常庄、窦店、富庄、黑古台、新街、辛庄。根据史料记载，房山区回族的迁入，可追溯到明清时期。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明朝大将徐达和副将常遇春率军，攻克了元大都的齐化门。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建立大明。1421 年，从南京迁到元大都，将大都改名为北平（明永乐元年改为北京）。迁都以后，北京城市人口和规模快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北京的回族也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徐达、常遇春的北伐，一些回族士兵来到北京定居，回族勋贵官员、富豪商贤也陆续迁徙而来安居落户。据京都《岗志》记载：“今燕都之回民，多自江南、山东等省份派来者。”这一记载至今也符合北京回民流传的“祖先是随燕王扫北，抵着龙尾巴来的”说法。

* 许冬梅：房山区史志办四级调研员



在这期间，房山地区也陆续有回族迁入。一些回族先民开始依傍交通顺畅的村镇建房定居，并以同姓同宗或异姓同亲为族体，以清真寺为居住地逐渐向聚集区发展。下面，以回族村的形成追根溯源。

常庄村位于拱辰街道南部。常庄原名常家庄，成村时间有待考证。据《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载，该村明代成村。另据村内清真寺碑文显示：清真寺始建于元朝末年，光绪十一年修葺扩建。按照回族“聚寺而居”特点，常庄村在清真寺建成前就已经形成了规模。全村有胡、刘、夏、许、洪、黄、赵、白等姓氏。虽有多姓加入，也历经历史岁月的洗礼和朝代更替，却始终保持着单一回族聚居不变的传统格局。

窦店村位于房山区东部，窦店镇政府所在地。辽以前成村，该村地处太行山东麓南下中原的古代交通大道上，是华北进京的打尖落脚之地，村中各种店铺众多。在清代之前，已有丁、杨、古、沙四个回族家族在此居住。根据窦店村居住的格局来看，多数回族村民在村南居住，可见是成村后陆续迁来聚居。该村还有姓仇、赵、肖、谢等回族村民。

富庄村位于良乡镇北部，明朝成村，最早迁来的是傅姓家族，因故叫傅家庄，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富庄村。清朝中晚期，回族人士开始迁入该村，主要姓氏是张姓。据村中老人追忆，张姓家族从山东省蓬莱迁入。当时，张家哥俩推着小车逃难到此，定居富庄村后以种地为生，后代繁衍家族不断壮大，先后形成了北张家和南张家。在大北院、前后院、小南院、北地、



东场等居住着多支张姓家族。

黑古台村位于良乡镇北部。该村回族的迁入在清朝中晚期左右。据村内老人记述，清道光年间，一位叫沙吉祥的山东汉子带着家人逃荒流落到黑古台落脚谋生。沙姓一家从原来的几口人，发展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家族。后来黑古台村又陆续迁来宛、薛、胡姓回族，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回族村落。

新街村是周口店镇辖村。明前成村，是大韩继村向西发展形成的居民点，故名新街村。新街村的回族主要姓氏有沙、刘、马、张、买等，其中沙姓回族人口较多，并与刘姓回族姻缘较密，最早的两姓祖坟同在一处。村内有清真寺1座，建于清康熙年间。村内有回族1000多人。

辛庄村位于周口店镇西南。明朝成村。村北面有一座平缓的小山叫大晷晃山，山的主体由优质石灰岩构成，烧出的石灰质轻、色白、黏稠度极高，是传统的建筑材料。当时的大韩继村村民上山采石，运回村里码窑烧灰。窑工们便在山下安家，由于烧灰的规模越来越大，聚集的人口越来越多，大晷晃山下形成了一个新的村庄，取名辛庄。辛庄村独特的石灰石资源吸引了不少的回族人在此落户，其中马、李姓回民迁来较早。马氏家族又分为三个比较独立的支脉，其中人数较多的一支马氏从甘肃马家沟迁来，来到辛庄以后，以开灰厂为职业，当时辛庄村大大小小十几家灰厂几乎都是马家开办的。提起大晷晃灰窑，方圆百里，名声大震，所烧制的白灰远销天津、保定、涿县、涿水、易县，就连北京城内的官民用灰，都到辛庄的灰厂来采买。



该村还有姓买、许等回族村民。

民国时期良乡城内也聚集着不少回族住户。据民国二十七年(1938)《河北省良乡县事情调查》记载：良乡县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其中，伊斯兰有穆斯林男448人，女370人，共计818人。县城有清真寺一座，位于良乡南大街路西。2002年，按照良乡新城规划被拆去。城内居住着赵、刘、金、谢、丁等姓氏。其中赵氏家族迁来较早，人口较多，有天王寺赵、黄土坑赵、红帽子赵之说。

房山区主要回族人口除集中在6个回族村外，在房山城关和燕山地区也有大量回族居住。

房山城关居住的回族主要有两大姓氏，被称为“南关马、北关谢”，都是经营传统清真饮食。南关马氏家族是1937年前后马天福、马天亮哥俩从河北省易县南关逃荒到房山南关，从事小买卖生意，卖过烟、米，开过饭铺名叫“两义轩”（现大千家具城附近），现有300多人。北关谢家，原居住在房山城北大寺一带。由于城市建设，现在谢家分布房山城关、良乡地区等地，有几十口人。

另外，青龙湖镇西北部水峪村居住着回族100多人。该村回族主要有宛、徐、李、王四姓，其中宛姓家族较大，据传当年宛姓兄弟俩从山西省迁入，大概在清朝中晚期。迁入后以卖羊肉、小枣粽子为生，后来形成南、北宛家四大门。

北京燕山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位于房山区域,1970年成立,建立之初得到了东北、西北两大石化基地的支援。在这支建设



大军中，有来自甘肃、青海、宁夏、黑龙江、辽宁、湖北、河北等地 800 多名回族同胞，以马、丁、肖、韩、黑、钱、景等姓为主，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回族的聚居区。

时年匆匆，遥想当年，房山回族先民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这块热土繁衍生息，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生活，不断发展壮大。截至 2022 年底，全区回族常住人口 6000 多人，在全区少数民族人口中，排名第二位。

悠悠千年发展史，深深兄弟民族情，回顾房山回族村发展的历程，就像一条逶迤的溪流，缓缓地流进了房山的历史长河，像一幅绚丽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房山的大地上，更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融进激昂奔放的旋律，奏响着房山美好明天的乐章。



房山的中学

顾梦红

一、1949年以前的北京（北平）的第一至第九中学

北京是全国最早出现现代化中学教育的，1864年建立的育英男子学堂和贝满女子学堂是北京最早的中等学校教育，1901年北京设立第一个官办中学堂——直隶高等中学校，即后来的地安门中学。

北京一中，1912年改称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校，1928年成为市立第一中学，地址在安定门内郎家胡同9号。北京二中是1902年建的中学堂，1912年改称公立第二中学校，1931年迁朝阳门内内务部街7号。北京三中是1910年成的中学堂，1912年改称公立第三中学校，1919年迁到西直门内祖家街1号。北京四中，1907年创建，名顺天府中学堂，1912年改称公立第四中学校。北京五中是1928年建立平民中学，1929年改称市立第五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迁东四北大街细管胡同13号。北京六中原为1923年创办的私立华北中学，1940年改为市立



第六中学校。北京七中前身是始建于 1931 的北平市私立镜湖中学，1941 年改为北京市公立第七中学。北京八中，最初由 1921 年建立的私立四存中学和 1947 年建立的北平市立八中发展而来，1949 年两校合并为北京市第八中学。北京九中的前身是 1946 年建立的私立门头沟中学，1949 年 10 月，更名为北京市第九中学。

二、新中国成立后新命名的排号中学

北京市第 10—20 中学，是 1950 年和 1951 年成立的新学校，都是男女合校。第 21—39 中学，多是 1952 年接收的教会和私立、公立中学校，按照顺序改为排号中学。

北京市的第 40—60 中学，基本都是 1952 年以后成立的新学校。开始是按照各区顺序排列，例如，40—44 中学在西城区，45—47 中学在海淀区，48 中学在朝阳区，49、50 中学在崇文区，51 中学在宣武区。1953 年以后，就不按照分区域排列了，而是按照成立时间先后顺序在全市大排行。例如，52 中学在门头沟、53 中学在西城、54 中学在和平里、56 中学在海淀、57 中学在朝阳、58 中学在崇文，62 中学在宣武区太平街，66 中学在西城区，67 中学在海淀。北京市顺序号最大的中学校是北京市二四零中学。

1958 年前，房山境内的北京排号中学只有北京 69 中（河南中学）和 70 中（周口店中学）。



三、房山境内的北京第 69 中学、第 70 中学 和第 100 中学

北京市 69 中学和 70 中学建立的背景。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房山境内分别属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县，均隶属河北省通县专区。1952 年 7 月，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将河北省房山县第一区 7 个村、第四区 22 个村、第五区的 46 个村（今河北镇、周口店地区及城关、坨里等地）以及良乡县的北车营村等 3 个村划归北京市；同年 9 月，北京市将上述地区与门头沟区合并组成京西矿区。

河南中学

1954 年 9 月，京西矿区政府为解决南部山区人民和矿区职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决定在河北地区建一所初级中学。校址选择大石河畔河南村东的一块台地上，征地 20 余亩。按照北京市的中学排号，定名为北京市第 69 中学，校长姬锡瑞。1954 年，设 2 个初中班 106 人。1958 年，划归房山县管理并增加了高中班，改称房山县河南中学。1961—1962 年，因三年自然灾害，高中停招两届，1963 年又恢复高中招生。

河南中学自 1954 年建校，在校长姬锡瑞领导下，发扬老解放区的光荣传统，每周五下午全校师生召开“时事政治”报告会，组织学生慰问军烈属。据 1957 年统计，有百分之



三十五的学生申请入团，百分之八十五的教师申请入党。1958年，在“大跃进”年代，河南中学师生投入“大炼钢铁”“筑路、修渠”等，教师刘君德为抢救学生献出了宝贵生命。1958—1960年，三届初中毕业生参加全县统考合格率分别在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八十，1961年高中毕业生升学率百分之八十以上，名列全县第一。1976年，河南中学初中、高中共有36个教学班，高中的—一个年级中就有12个班，班容量平均54—58人。全校当时有98名教职员工，学生1500多名，是河南中学历史上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1990年，有初、高中6个年级、19个教学班，在校生806人，教职工103人。2005年，房山区将山区中学的学生—次性搬迁至平原地区就读，河南中学停办。

周口店中学

1954年，当时周口店地区属京西矿区管辖，北京市政府根据周口店地区地理环境、形势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决定与京周公路同时起步，在周口店地区建立北京市第70中学。北京市政府从北京第二十八中学抽调很有经验的文如仲、高先华同志来周口店筹建第七十中学，很快完成了学校选址、征地及学校的初步建设规划工作。校址选在周口店村西南的一片乱石滚滚、杂草丛生的丘陵地。占地面积八十余亩。第一期工程先建五百平方米的教室和职工宿舍及办公室。后来由于京周公路从学校规划占地的东南向西北斜插而过，学校只得分为东西两院。学校占地面积4.7万多平方米，有教学楼两栋，总建筑



面积 9400 多平方米。

1955 年 8 月第一期工程完工，同年 9 月 15 日正式开学上课。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学校的行政工作与党务工作归属有别，行政归北京市教育局领导，学校党支部隶属于矿区党委领导。建校初期只有初中 4 个教学班，200 名学生，教职工 12 人。1958 年 9 月增设高中班。1990 年，有初高中 6 个年级，28 个教学班，学生 1353 人，教职工 150 人。

今天的北京市 69 中学在广安门内，70 中学在原宣武区。

北京市第 100 中学

北京 100 中是房山境内第三个北京市的排号中学，这是房山人很少知道的学校，也是一段不为常人所知的历史。

这个学校与良乡机场有着密切的联系。1957 年，良乡地区还属于河北省辖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及其所属国防体育系统出于为中国空军培养后备力量的需要，在河北省良乡县黄辛庄西部兴建了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1958 年，良乡县划归北京后，改称为北京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重点进行跳伞运动、航模运动、滑翔机运动等国防体育内容的训练和比赛活动。1963 年，北京市为培养青少年后备力量，与国家体委合办了包括航模、滑翔、跳伞等训练项目的体校，在良乡成立了北京市第 100 中学。学校从全市招收符合空军飞行员条件的青年，开设有初中班和高中班，把学习文化课和进行飞行员培训结合起来，先后有三届学生毕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培养了后备



力量。196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海军司令部和北京空军司令部三单位派出人员进行军管。1973年，撤销北京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正式移交给海军运输大队，100中学的历史就此终结。学生多数下乡插队，部分干部教师转到房山县教育系统工作，奚滨楚、张德明等人还担任了领导干部，孟庆云、林定慧等教师进入房山教师进修学校工作。

四、房山境内的地域性排号中学

房山境内的中学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8月，房山县伪政府把原农职班改建成房山初级中学，学制三年，校址在房山城关小学院内。1945年9月，良乡县政府把原县农职班改建为良乡初级中学，校址在城内罗府街，一年后迁址良乡城内东斜街孔庙。

1948年12月，房山、良乡两县先后解放，人民政府接管这两所中学，成立党支部，取消旧的管理制度，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1954—1955年，河南中学、周口店中学相继招生开学。1956—1957年，房、良两县分别在赵各庄、南尚乐、交道、魏各庄、佛子庄、南窖、金鸡台、坨里等地建立初中。1958年，文化教育大发展，房山县有房山中学、良乡中学，河南中学、周口店中学四所完全中学；初中由14所增至29所。三年困难时期，撤并了柳林水中学等几所初中学校。

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制缩短，提倡“初中不出村，高



中不出社”，初中达到 100 多所，高中 88 所。这些学校都是根据所处的乡镇、村而命名。房山二中和良乡二中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房山二中建于 1973 年，良乡二中建于 1975 年。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二中的排序是以房山中学和良乡中学为第一中学，然而实际上，房山中学、良乡中学从来没有挂过房山一中、良乡一中的牌子。

20 世纪最后 10 年，随着房山城关和良乡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建立初中学校的需求十分迫切，这两个地区分别出现了三中和四中。房山三中位于城关饶乐府村东，1991 年成立；房山四中建于 1995 年，位于城关永安西里附近。良乡三中初建于 1995 年，1996 年 9 月开学。1998 年良乡三中撤销，原址改建为北师大良乡附中。2001 年 9 月，在良乡苏庄大街又再建立良乡三中。良乡四中建于 2001 年 9 月，校址位于良乡镇太平庄村。此间，还出现过周口店二中（娄子水中学），张坊二中（西白岱中学），但是这个名称使用的时间都很短。

房山五中、良乡五中

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原因，房山区的山区学校普遍存在规模小、办学条件差等问题，教育质量与平原地区特别是城镇地区形成了明显的梯级差距。进入 21 世纪，北京市加大发展农村教育，为了整体提升山区中学的教育水平，房山区决定实施山区中学搬迁工程。2005—2006 年先后撤销十渡、霞云岭、南窖、大安山等多所山区初中校，将 2600 多名学生一次性外迁



到新建的房山五中和良乡五中，让山区的孩子享受到现代化教育。需要说明的是，此前的房山二中、三中、四中都地处房山城关境内，房山五中、良乡五中这两个“五中”有些另类。房山五中位于房山区周口店镇娄子水村南，原红光机械厂旧址；良乡五中位于阎村镇大董村村北。两个“五中”开学之前，有关方面曾就校名多方征求意见，有位学者曾经建议，位于周口店镇的新学校名为“龙山中学”，位于大石河东岸的新学校名为“圣水中学”，可惜未被采纳。2010年10月，原官道中学学校更名为“北京市房山区良乡第六中学”。这是最近命名的地域性排号中学。

（此文借鉴参考了潘惠楼老师和章世铭先生的文章，在此深表感谢）